《臺灣史研究》
第 29 卷第 1 期，頁 209-247
民國 111 年 3 月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研究討論

2018-2019 年臺灣經濟史研究的回顧*

莊濠賓**

摘　要

本文係對 2018 年及 2019 年臺灣經濟史研究的回顧。首先由 2008 年始至 2017 年為止，梳理出十餘年來經濟史在各項子題的發展概述；其次則對 2018 年及 2019 年兩年間的經濟史研究進行其大要的回顧，最後則是對經濟史未來發展的看法。

此兩年的研究之中，筆者將之略分為一、「國家、經濟政策與財政體制」，並分為清代與日治、戰後初期與當代；二、「區域史」，分為北部、中部與南部；三、「產業史」，分為農業、工業及商業、林業、電力及通訊；四、「飲食消費及遊憩」；五、「環境與社會經濟變遷」，並試圖就其整體趨勢來加以歸納與討論。區域史與地方產業史在資料取得的便利性與範圍較易控制，一直是研究大宗，而飲食、遊憩、環境等議題也日益受到重視，經濟史逐漸與社會史、文化史等結合；而傳統的研究課題，在新的史料陸續出現後也逐漸轉化或修正。

由於我國推動地方創生政策，地方的文史建構將成為趨勢，加以地方政府持續推動文史計畫或地方學的深耕，及各公營單位陸續開放早期難得一見的史料，對於地方經濟史的研究有推波助瀾之效，在可預期的數年內，此類研究仍將維持一定的數量。綜其來看，整體的研究走向雖仍有著前幾年回顧所指稱的隱憂，但在方法論的持續精進與史料的出現，臺灣經濟史研究應是朝著正面的方向前進。

關鍵詞：臺灣經濟史、區域史、產業史、地方學、經濟政策

---

* 本文原宣讀於 2020 年 12 月 11 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主辦的「2018-2019 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感謝與談人張怡敏教授與審查人的悉心指正。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臺灣農村社會文化調查計畫」）博士級專案研究員

來稿日期：2021 年 7 月 21 日；通過刊登：2021 年 10 月 12 日。

一、前言
二、國家、經濟政策與財政體制
三、區域史
四、產業史
五、飲食、消費及遊憩
六、環境與社會經濟變遷
七、研究觀察
八、結論

一、前言

自 2008 年首次舉辦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以來，經濟史回顧一直有重要地位，2018 年及 2019 年的經濟史研究篇數約 200 篇，較 2007 年相比明顯減少，這 12 年的時間裡，經濟史研究經過低潮、轉化，趨勢也不斷變化。2007 年經濟史研究只有 144 篇，相對於政治史的 308 篇及社會文化類的 362 篇，經濟史的研究能量明顯偏少，加上社會文化史研究能量快速提升，與經濟史的研究呈現此消彼長之勢。對於經濟史的前景，執筆〈2007 年臺灣經濟史的回顧與展望〉的林玉茹看法是較為悲觀的，她點出幾個趨勢，一是清代臺灣經濟史研究持續減少，二是跨時期研究偏少，研究者仍慣以斷代研究為主，且多集中在日治及戰後時期。[1] 到了 2008 年，趨勢則不同，此年被歸類在經濟史範疇的即有 200 篇之多，又以土地、水利開發等可被歸納為區域史領域的研究居多，其中以單一地域為研究範圍，從拓墾、聚落發展、水利建設、祭祀、族群互動等的演變為其熱門，這種趨勢乃因從 2000 年以後許多與臺灣研究相關的研究所碩士班成立有關，基於鄉土情懷而研究自身家鄉歷史者眾。至 2010 年經濟史數量下降至 87 篇，該年的分析者並未

[1] 林玉茹，〈2007 年臺灣經濟史的回顧與展望〉，《漢學研究通訊》(臺北) 28: 4 (2009 年 11 月)，頁 19。

解釋原因，筆者猜測可能是因為分類編目所致。

雖然研究數量減少，但受到社會文化史的影響，也開拓了新的研究範圍，2010 年的回顧即點出了產業史領域延伸至柑橘、玻璃、菸草及糕餅業等，隨著網路的日益發達與資料的多元應用，以及社會文化史的影響，產業史的擴張當是可預期的。但問題在於個別產業史常是建基於區域發展的概念之上，不免過度強調地方產業的重要性，落入見樹不見林之境。自此之後，隨著對特定議題的關注，經濟史的研究能量呈現快速提升，產業史除增加以往鮮少人注意的產業外，對技術變革、生產方式的探討更逐漸被關注，而土地問題、產業政策也有所進展。

看似谷底反彈的經濟史實則有著不少的問題，在針對 2011 年的經濟史回顧中，洪紹洋就認為近現代經濟史的研究成果既缺乏宏觀的討論，也較不注重經濟史長期脈絡及構造問題；[2] 李力庸也指出，許多單一的議題被開發殆盡，如農業史為主要作物的研究即是如此，單一農產為主的學位論文轉為趨向產業與地方社會的連結，此類議題尤為文化和觀光系所青睞及投入，而非歷史學門。[3] 洪紹洋也發現到，2016 年至 2017 年農林漁牧的學位論文增加許多，在農業史一項上，更從多個視角切入進行考察，地域經濟史也因各大學開設 GIS 等課程而維持著較高的數量，[4] 而在整體的趨勢中，日治時期的經濟史研究又多於戰後，且戰後較嚴謹的研究多僅至 1960 年代，1960 年代之後的研究多為社會學者討論現代經濟時的前提背景，故經濟史的整體研究有著明顯的斷層。

縱觀 2018-2019 年的趨勢，若依其分類，已將近 200 篇，扣除編目不明及歸類有疑問者，仍有將近 180 餘篇，由於筆者的能力不足，無法逐一對每篇論文進行介紹及評論，僅能挑選部分論文進行說明。在本文的章節安排上，除前言外，以一、國家、經濟政策及財政體制；二、區域史；三、產業史；四、飲食、消費及遊憩；五、環境與社會經濟變遷；六、研究觀察，以及結論分別述之。

---

2 洪紹洋，〈2011 年臺灣史研究回顧與展望：經濟史〉，發表於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2011 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行政大樓 7 樓第一會議室，2012 年 12 月 7 日），頁 17。

3 李力庸，〈深耕臺灣：2013-2015 年農業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漢學研究通訊》36: 4（2017 年 11 月）頁 13。

4 洪紹洋，〈2016-2017 年臺灣經濟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臺北）26: 2（2019 年 6 月），頁 166。

二、國家、經濟政策與財政體制

（一）清代及日治的討論

臺灣自開港後的劇烈改變，繼之日本殖民政府的統治，說是形塑出當代臺灣的雛形亦不為過。早期的研究過於側重外國資本主義的壓迫，經過逐漸修正後，轉向認為本地資本在過程中逐漸自立茁壯並成為不可忽視的力量，成為近年來清代及日治經濟史的重點。

李佩蓁的〈商民樂從？：臺灣釐金制度與官商利益結構（1857-1886）〉[5] 旨在探討當臺灣傳統的官商利益結構在遭遇釐金制度時會產生何種效應，又是否會融入官商利益結構？作者認為前人研究認為臺灣傳統行郊在受到洋商的衝擊後而式微的看法有修正的空間。傳統行郊的勢力仍舊穩固，官員雖然推動釐金抽取，但仍被商人逃漏或中飽私囊，因此最好的辦法仍是由商人來進行包辦，而官方的進帳也能獲得穩定成長，作者即言，這並非是國家控制力的增強，而是官商利益結構的穩固，巡撫劉銘傳也無法對這一結構有所置喙，財政制度的推動仍需要官民雙方不斷的衝突與協調。

李佩蓁的另一文章〈制度變遷與商業利益：以中英商人在臺灣樟腦貿易的行動為中心（1850-1868）〉，[6] 探討地方商人在樟腦包賣制度過渡到條約體制的變遷背景下，如何實際操作樟腦貿易。該文指出中英商人為了謀求樟腦貿易之利而因應軍工匠制與條約體制的需求，隨時變換其商業經營策略，貿易衝突與其說是「自由」或「壟斷」兩種概念的衝突，倒不如說是與地方官員和商人的實質利益有關。

對外貿易的推動與發展中，清代郊商一直是重要的一環，郊商是商人所組織的團體，對貿易的推動是不可或缺的，但郊商究竟從何出現？林玉茹的〈政治、族群與貿易：十八世紀海商團體郊在臺灣的出現〉[7] 正是回答這一課題，要出現

---

5 李佩蓁，〈商民樂從？：臺灣釐金制度與官商利益結構（1857-1886）〉，《臺灣史研究》25: 2（2018 年 6 月），頁 61-95。

6 李佩蓁，〈制度變遷與商業利益：以中英商人在臺灣樟腦貿易的行動為中心（1850-1868）〉，《新史學》（臺北）30: 1（2019 年 3 月），頁 1-53。

7 林玉茹，〈政治、族群與貿易：十八世紀海商團體郊在臺灣的出現〉，《國史館館刊》（臺北）62（2019 年 12 月），頁 1-51。

郊商就必須有其環境，1725 年以前尚不存在郊出現的環境，但 1725 年的兩件事與郊的成立至關重要，一是官莊被充公，使文官私下不再有充裕的經費運用，而使得地方的公共建設轉嫁至民間；二是閩浙總督覺羅滿保清查臺灣的糖船貿易，使控制臺灣對外貿易的商人無所遁形，成為地方官勸募的主力，而往往是為了共同籌款應付地方公事，在偶然的契機下成立，1760 年代以後才具備團體郊成立的條件。產生的契機，乃是覺羅滿保來臺清查糖船貿易，商人被迫浮出臺面，並成為來臺官員勸募的主力，因此形成了郊，而郊商海上貿易的特性表現在對信仰上，建廟、修廟之上，並將廟宇當成議事場所，卻很少興建專屬建物，這也是郊與公所、會館不同之處。

在開港後，各國洋商來臺建立洋行（Company），怡和（Messrs Jardine Matheson & Co.）、寶順（Dodd & Co.）、德記（Tait & Co.）、水陸（Brown & Co.）等眾多洋行紛紛設立據點，帶動了茶葉及樟腦的貿易。研究者如黃富三、林滿紅、葉振輝、林玉茹、李佩蓁、黃頌文等亦對洋行及買辦有深入的研究，[8] 補足了清末涉外貿易的圖像，但是有關日治時期洋行的情況則少有人研究，鍾淑敏的〈英商三美路商會（Samuel Samuel & Co., Ltd.）與日治前期臺灣的產業發展〉[9] 一文就有其重要性。作者探究三美路商會及相關人士與臺灣產業的關聯，其中荒井泰治、黃東茂兩人實舉足輕重。荒井泰治協助三美路商會取得在臺的樟腦專賣權後，本身也多角化經營在臺事業，除投資鹽水港製糖會社外，也在東部投資多項事業，成為在臺日人的領導者。黃東茂則藉由經銷三美路煤油發跡，並與之成為買辦關係，再藉

---

8 如黃富三，〈清代臺灣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上）〉，《臺灣風物》（臺北）32: 4（1982 年 12 月），頁 104-136；黃富三，〈清代臺灣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下）〉，《臺灣風物》33: 1（1983 年 3 月），頁 92-126；黃富三，〈清代臺灣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續補）〉，《臺灣風物》34: 1（1984 年 3 月），頁 123-140；黃富三，〈臺灣開港前後怡和洋行對臺貿易體制的演變〉，收於黃富三、翁佳音主編，《臺灣商業傳統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9），頁 81-106；葉振輝，〈天利行史事考〉，《臺灣文獻》（南投）38: 3（1987 年 9 月），頁 41-45；葉振輝，〈一八五〇年代怡和檔臺灣史料輯要〉，《高市文獻》（高雄）6: 3（1994 年 3 月），頁 1-15；葉振輝，〈一八六〇年代怡和檔臺灣史料輯要〉，《高市文獻》6: 4（1994 年 6 月），頁 1-16；葉振輝，〈一八六〇年代怡和檔臺灣史料輯要（續）〉，《高市文獻》7: 1（1994 年 9 月），頁 1-24；林玉茹，〈從屬與分立：十九世紀中葉臺灣港口城市的雙重貿易機制〉，《臺灣史研究》17: 2（2010 年 6 月），頁 1-37；李佩蓁，〈依附抑合作？清末臺灣南部口岸買辦商人的雙重角色〉，《臺灣史研究》20: 2（2013 年 6 月），頁 31-76；黃頌文，〈清季臺灣貿易與寶順洋行的崛起（1867-1870）〉，《臺灣文獻》61: 3（2010 年 9 月），頁 107-149 等……。

9 鍾淑敏，〈英商三美路商會（Samuel Samuel & Co., Ltd.）與日治前期臺灣的產業發展〉，《臺灣史研究》25: 2（2018 年 6 月），頁 97-143。

其發展自身事業。這兩人對於日治前期臺灣的產業發展均有相當程度的參與。

若說清代臺灣晚期前的對外貿易取決於郊，則 1860 年開港後，各國洋商均進入臺灣，但洋商在整個對外貿易中的角色如何？陳計堯的〈人流、物流、金流：條約港體制下南臺灣與日本的經貿關係（1865-1895）〉[10] 關注清末開港後的貿易，作者透過「條約港體制」及中介人的角色，指出體制背後實是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當日本統治臺灣後，實施與自由放任思想背道而馳的保護主義，開始驅逐洋商，導致日後與世界企業發展有所差異。從條約港體制到殖民地體制，從依賴中介人到取締中介人而直接投資，正是東亞與其他區域經營體制的交錯互動。

林文凱的〈晚清臺灣的財政：劉銘傳財政改革的歷史制度分析〉[11] 一文，關注課題可說是臺灣史學界爭論已久的課題：近代化是從劉銘傳的改革亦或是後藤新平的施政開始？作者長期關注晚清劉銘傳及後藤新平改革的比較研究，[12] 欲釐清劉銘傳的財政改革是否具有近代化的內涵並作為後藤新平在改革時的基礎？前人研究多認為劉銘傳的多項改革使臺灣的財政獲得改善，並在建省後達到財政自主。作者則解釋，劉銘傳的改革成效並非如前人研究般的耀眼，在財政體系的徵收結構上，仍是依循著家產官僚制的組織，透過委任或承包的機會居中營利，這種制度難謂是具制度性意義上的理性化意圖，僅能稱是傳統帝國財政體制框架上的一種內在調整，本質上仍是官員與地方菁英合作的官商利益結構，而非科層官僚體制為基礎的近代理性化財政結構，不具近代化意義。作者強調，貫時性的視角比較才能有效定位劉銘傳改革的性質，他的改革雖然某些方面仍有近代化的意義，也構成後藤新平改革的歷史基礎，但仍不具近代理性化的內涵，與後藤新平財政改革之間的斷裂性遠高於連續性，而臺灣近代財政體制的建立乃是承繼明治維新的西方近代化經驗。

林文凱的〈貌合神離之兩岸關係：戰爭前夕福建與臺灣的經建與農業調查之

---

10 陳計堯，〈人流、物流、金流：條約港體制下南臺灣與日本的經貿關係（1865-1895）〉，《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臺南）18（2019 年 11 月），頁 7-67。

11 林文凱，〈晚清臺灣的財政：劉銘傳財政改革的歷史制度分析〉，《臺大歷史學報》（臺北）61（2018 年 6 月），頁 341-392。

12 其相關著作有：林文凱，〈晚清臺灣開山撫番事業新探：兼論十九世紀臺灣史的延續與轉型〉，《漢學研究》（臺北）32: 2（2014 年 6 月），頁 139-174；林文凱，〈臺灣近代統治理性的形構：晚清劉銘傳與日治初期後藤新平土地改革的比較〉，《臺灣史研究》24: 4（2017 年 12 月），頁 35-76。

交流（1934-1937）〉，[13] 將重心放在中日戰爭爆發前夕的福建省如何透過交流實施農政近代化建設的過程，他指出前人研究忽略了福建省政府為何積極回應南進政策，及忽略了臺灣總督府的主導和臺灣農政專家的活動所造成之影響。作者指出，知日派的陳儀透過自己及屬下參訪臺灣，除減緩日本南進侵略的急進外，也想吸收臺灣經驗供福建省進行現代化工程，而派遣來臺的陳振鐸和張天福兩人的確對福建省的現代化做出正面貢獻。作者更指出，在戰爭結束之際，蔣介石委任陳儀所組織的臺灣調查委員會延攬其主政福建時期的官員及臺籍菁英擔任調查委員，負責對臺的調查及接收工作，這些人在日後對於臺灣及福建兩地的發展均有正面影響。

作者另一篇〈日本治臺經驗取鑑：戰前福建官方的臺灣調查與考察活動之分析（1911-1933）〉，[14] 則將重點放在由福建為主的角度，對這些考察所造成的深層脈絡進行分析，並對臺灣總督府及福建官方兩者相互為用卻同床異夢的關係有深入分析。

陳凱雯的《日治時期基隆築港之政策、推行與開展（1895-1945）》[15] 一書，係由博士論文改寫而來，作者不僅關心港口建設，更關注臺灣在近代化的工程中，築港本身意涵及對基隆乃至東亞的影響。有別於清政府對於基隆築港的排斥，臺灣總督府將基隆築港視為南進的重要工程，國家主導的成分極為濃厚，至後期，基隆港不僅是殖民政績的展現，也深刻改變基隆的地方社會。

（二）戰後及當代

就戰後經濟史的研究而言，有兩個時間點是關鍵重要的，即 1945 年以後所衍生的連續與斷裂概念，及 1949 年後臺灣成為獨立國民經濟體的概念，由此衍伸出的是臺灣史與中國近現代史各自所關注的議題之分軌。[16]

---

[13] 林文凱，〈貌合神離之兩岸關係：戰爭前夕福建與臺灣的經建與農業調查之交流（1934-1937）〉，《臺灣史研究》25: 4（2018 年 12 月），頁 119-162。

[14] 林文凱，〈日本治臺經驗取鑑：戰前福建官方的臺灣調查與考察活動之分析（1911-193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臺北）101（2018 年 9 月），頁 117-155。

[15] 陳凱雯，《日治時期基隆築港之政策、推行與開展（1895-1945）》（臺北：國史館，2018）。

[16] 洪紹洋指出：「關於此段時期的轉變，可從臺灣史的縱深與中國近代史的延長兩個角度進行考察。臺灣史縱深所注目的議題，聚焦在本地民間資本的累積型態，還有土地改革對地主、資本家與農民的影響。中國近現代史的角度所關注的議題，耙梳大陸系官僚與資本家來臺後的影響，或集中在政府賢明政策的推行。近期開始有同時關注臺灣本地與來自中國大陸兩方資本家的活動，提出合軌之觀點。……」洪紹洋，〈2016-2017 年臺灣經濟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頁 169。

陳鴻明〈政治巨變與企業因應：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遷臺與復業的曲折發展（1950-1965）〉[17] 即點出上海商業銀行來臺復業所遭遇的困境。1949 年後，上海商業銀行面臨著兩岸三選點復行的抉擇，後雖決定遷往臺灣，但復業過程屢遭政府阻止，後因向臺灣進行諸多投資，並提出諸多保證，消弭政府的疑慮，加以臺灣經濟需求才得以復業，作者指出劉進慶所言官商資本是「經由政權保護企業經營，使得官僚同時也成為商人，即資本家（既官且商，亦官亦商）」則上海商銀在臺復業理應順利，事實並非如此，故當代官商資本的複雜程度實更為複雜。

黃正宗的〈戰後臺灣戰爭保險金求償問題研究（1945-1957）〉，[18] 是少見保險的題材。日本戰敗後，民眾投入的對日債權求償多數都延宕許久，而戰爭保險金更是由政府所墊付的特殊案例。戰爭保險金本身非保險業務範圍，而是由日本政府所墊付的政策性保險，戰後由戰爭損害保險金償還促進會所推動的求償過程因政府的兩面手法而不順利，政府擔憂的是若經墊付，其他對日債權團體也會比照辦理。經過十餘年的努力，政府終同意墊付，這是政府「救濟」受災保戶的結果，而其他債權團體跟進求償的狀況也未如擔憂的發生。

歐素瑛的文章，以臺灣省參議會議員的角度一窺戰後政府對於糧荒的問題處理，[19] 歐氏運用大量的議員質詢為主軸，輔以政策推動的成效為辯證，跳脫以往糧政研究多關注在行政長官公署於糧荒形成的角色，一探民意機構在戰後初期的監督效果。歐氏的文章提醒了我們，戰後的省議會之角色，終究只是提出質詢、建言，那麼在觸及更深的層面如土地問題時，省議會能否迫使中央政府讓步？答案顯而易見是無法的。

黃仁姿、薛化元考察水利會與農會經過整併與戰後的接收後，兩者在組織特性上產生相反狀況。[20] 水利組織受到國家支配的程度日趨強烈，公共化性質逐漸消逝；而原本官方色彩濃厚的農會，經過戰爭末期的整併，將奠立於臺灣民間資

---

17 陳鴻明，〈政治巨變與企業因應：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遷臺與復業的曲折發展（1950-1965）〉，《國史館館刊》60（2019 年 6 月），頁 89-138。

18 黃正宗，〈戰後臺灣戰爭保險金求償問題研究（1945-1957）〉，《臺灣文獻》70: 2（2019 年 6 月），頁 33-83。

19 歐素瑛，〈臺灣省議會對糧荒問題之調劑（1946-1951）〉，《臺灣學研究》（新北）22（2018 年 4 月），頁 35-76。

20 黃仁姿、薛化元，〈戰時與戰後初期臺灣農業組織的調整與變革（1941-1948）〉，《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臺北）51（2019 年 5 月），頁 121-172。

本的產業組合也納入農會，官方色彩逐漸被民間勢力所取代。因此在戰後初期，民間勢力於農會較具影響力，而水利會相對由官方的行政力量掌控。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汪小平的〈臺灣經濟政策改革緣起探討（1950-1960）〉一文，[21] 則從 1950 年代美國對臺經濟政策演變、臺灣政治環境與自由主義經濟學傳播三個面向來探討，美國對臺灣的態度改變於韓戰爆發，對於臺灣經濟的發展乃是建議扶植，但充其量是作為外部的推動力，政治環境的穩定有利於國民黨當局，加以陳誠為首的官員積極推動，及自由市場經濟學說的散播，才有經濟改革的出現。

中國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副教授黃俊凌的〈光復初期臺灣善後救濟分署平售救濟麵粉之探析：與蘇瑤崇先生商榷〉一文，即是要反駁蘇瑤崇對戰後善後救濟分署將麵粉出售解釋為「以牟利其中無本暴利」的說法。作者指出，分署出售麵粉不在於營利，而是為抑制市面上糧價的飆漲，就效果而言，雖僅是治標，但也起到安定人心的效果，而分署對於出售的辦法也勉力防弊，並無十足奸商政府之行為。[22]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李理的〈1950 年「臺日貿易協定」的簽訂及影響〉[23] 則指出國民黨遷臺後，於百廢待舉中由盟軍總部促成與日本的貿易協定，使臺灣解除了缺乏外匯難以開展大宗貿易的窘境，從而獲得各種物資以恢復經濟，也在外交困境時爭取到有力盟友，其作用是不可忽視的。

在土地經營問題上，長期以來學界所關心的多是土地改革、農地租佃及經營，這類課題已累積不少豐碩之成果，莊濠賓的〈世變下臺灣地主層的沒落：以四大公司民營化為例（1949-1957）〉[24] 為其博士論文，探討在土地被徵收之後，地主所面臨的困境。政府雖宣稱要導引農業資金流向工業，卻又不健全法令，地主不

---

[21] 汪小平，〈台湾经济政策改革缘起探讨（1950-1960）〉，收於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編，《近代台湾史研究的新进展：纪念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 7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頁 747-762。

[22] 黄俊凌，〈光复初期台湾善后救济分署平售救济面粉之探析：与苏瑶崇先生商榷〉，收於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編，《近代台湾史研究的新进展：纪念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 7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頁 704-718。

[23] 李理，〈1950 年「台日贸易协议」的签订及影响〉，《台湾研究》（北京）156（2019 年 4 月），頁 85-94。

[24] 莊濠賓，〈世變下臺灣地主層的沒落：以四大公司民營化為例（1949-1957）〉（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8）。

僅如瞎子摸象，也須與都市資本家共同競爭，最終即是邁向衰敗一途。

莊濠賓的〈戰後的土地改革在桃園：以地主為中心的視角研究（民國 38-44 年）〉[25] 則試圖結合土地改革與區域史，旨在探討土地改革時，桃園縣地主面臨的情況。耕者有其田共徵收了 14 萬 3 千甲的農地，桃園縣被徵收的農地占 16%，居全臺之冠，較第二位的新竹縣多出近 1 萬甲，從區域差異來看，臺北縣、桃園縣及新竹縣三縣被徵收農地占了 34.7%，何以耕者有其田在桃園會徵收如此多，關鍵在於土壤肥沃程度、種植作物影響了租佃關係，才會在土地改革時被徵收。

在政府於 2009 年推動小地主大佃農的政策之前，臺灣農業規模無法擴大，一方面係是因耕者有其田之故，一方面則是三七五減租對佃農的保護，使後繼地主不敢輕言租賃土地，臺灣農業走向小而精緻化的道路正是政策所致。因此，農地重劃與其他的土地政策的功效就至關重要，李進億的〈八七水災與農地重劃：以災區農地重劃為中心的考察〉，[26] 即探討此次重劃的意義在於使政府對重劃增加經驗，以利推動後續的重劃，本文就性質言較屬於介紹性文章。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程朝云的〈土地政策與農業現代化：戰後臺灣「第二次土地改革」之爭〉，[27] 闡述 1970 年代後農業政策的路線之爭，及何以歌頌不斷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在實施將近二十年就引起了反思。1970 年代時，臺灣農業面臨瓶頸，對實施農業現代化看法，有了三種路線差異，分別是要求實施第二次土地改革的經濟學者、以及支持耕者有其田的地政系統，及持中間立場的農復會系統。近年來學界對於土地改革的研究逐漸熱絡，其推動的原因、成效及影響均有不同看法，[28] 論者多關注於土地改革起源的政治因素，而顯少觸及對土地改革的效益評價，程氏一文則供吾人重新思考土地改革與農業發展的關聯，是否全然正面？1960 年代後農業衰退雖與工業快速發展有關，土地改革也可能產生負面影響：如農地轉移的僵固、耕地面積縮減等。故本篇文章可做為另一個檢視的視野，這亦看出在土

---

25 莊濠賓，〈戰後的土地改革在桃園：以地主為中心的視角研究（民國 38-44 年）〉，收於李力庸主編，《經緯桃園：2018 桃園學》（桃園：桃園市政府文化局，2019），頁 135-177。

26 李進億，〈八七水災與農地重劃：以災區農地重劃為中心的考察〉，《臺灣史學雜誌》（臺北）26（2019 年 6 月），頁 39-64。

27 程朝云，〈土地政策与农业现代化：战后台湾「第二次土地改革」之争〉，收於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編，《近代台湾史研究的新进展：纪念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 7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頁 763-777。

28 有關於此，可參閱陳兆勇、黃樹仁、廖彥豪、瞿宛文、徐世榮及莊濠賓等人的相關論述。

地問題的研究上仍有許多可探討的空間。

都市中的土地問題探討，多集中在建築學界，對於不動產之問題僅兼論及而少有完整之論述，[29] 鄧宏旭的碩士論文〈日治時期臺灣都市不動產業之形成與影響：以基隆、臺北、高雄為例（1895-1936）〉，[30] 就有其重要性。他探討日治時期兩港一市的不動產業之形成，由日本不動產會社所帶動的大肆購買土地的熱潮，並接受總督府的補助，當人口增加並湧入都市後，又進一步助長不動產會社的發展，這波熱潮並趕上 1920 年代都市計畫的列車，新式住宅的建立，不僅是都市計畫的一環，也是殖民地意象的表現；而大量湧入都市的人口所形成的房屋租賃市場正如同今日一樣受到高租金的影響，進而成為社會問題。作者透過不動產會社與殖民政府之間的互動，兼論對地方社會的影響，也能扣緊對現今社會之反思。

三、區域史

區域史一直是臺灣史研究中的主力之一，也是大學研究所較常見的研究課題，許多研究者從關懷鄉土的立場出發，一方面具有研究熱誠，一方面則是議題較容易聚焦且具地利之便，既能使用口述訪談，研究材料也隨著史料數位化的推動而容易蒐集。隨著資料的快速累積，在研究的議題上也擺脫早期僅是討論單一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或仕紳、地方公廟的影響，轉為專研國家力量、重大工程、特殊產業對區域的影響，但亦有見樹不見林的風險。整體而言，隨著相關議題的研究積累，區域史研究在可預期的未來，處理方法上將會更形細緻，且結合研究區域中具突出領域如農業、工業，形成既是區域史兼具產業或是政策史的研究性格。

（一）北部

張心穎的〈基隆港區域發展與市街地景變遷〉[31] 關注基隆築港後的變化，以

---

[29] 相關研究僅有陳正哲，〈植民地都市景観の形成と日本生活文化の定着：日本植民地時代の台湾土地建物株式会社の住宅生産と都市経営〉（東京：日本東京大学大学院工学系研究科博士論文，2004）。

[30] 鄧宏旭，〈日治時期臺灣都市不動產業之形成與影響：以基隆、臺北、高雄為例（1895-1936）〉（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8）。

[31] 張心穎，〈基隆港區域發展與市街地景變遷〉（花蓮：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碩士論文，2018）。

基隆港周邊發展及地景變化為主，從人與地的互動來討論何以基隆數十年來始終無法脫胎換骨，詳細釐清了港口周邊的街庄發展，並試圖解釋歷任市長的選舉口號及加以驗證成效，但其核心主軸人與地的互動，卻無法突出，是較為可惜之處。

韓尚儒的〈竹東發展與林業變遷（1940-1989）〉[32] 討論自 1940 年後竹東因林業而發展的變化，該文對於竹東林業乃至林業相關政策有詳細的描述。然而，該文也說到竹東的產業尚有石油、煤炭、水泥等，各類產業所引起的效應也很難清楚的劃分，如何清楚的論斷單一行業對區域發展的影響，是此類區域史研究的問題。

自 1718 年王世傑率領親族開墾竹塹埔，至 2018 年時正好已是 300 年，新竹市文化局藉由《從清代到當代：新竹 300 年文獻特輯》一書，收錄包含族群及語言、教育文學及文化、宗教及人物、區域與生態環境等四大面向的專論，其中與經濟相關的，係為李維修的〈消逝的逆旅：竹陽軒與塚迺酒家〉[33] 及陳鸞鳳的〈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的發展〉[34] 二文，李維修以兩家旅館來窺看新竹的發展，兩家旅館不僅是當時新竹首屈一指的旅館，也是地方仕紳聚會的場所，透過其描述，供讀者了解日治時期新竹的社會樣貌；陳鸞鳳關於竹科一文，先描述竹科的設立過程及產業發展，其次論及對新竹市的影響，但關於竹科之研究已汗牛充棟，該文並無太大突破。

地方學的推動是區域研究的另一主力，其中桃園學的推動及《桃園文獻》的密集出版，是桃園研究快速累積的主因。2019 年由李力庸主編的《經緯桃園：2018 桃園學》一書中，就有不少關於桃園經濟的專論，分別是張怡敏、李力庸、鄧宏旭及莊濠賓等。張怡敏的〈新高銀行與北臺灣茶業的資金流動：兼論桃園地區三支店的經營〉[35] 一文，作者雖透過茶葉來探討新高銀行在北臺灣的營運，但實則指出淺山地區的經濟體系並非封閉，相反的，透過國際商品：茶葉，北臺灣淺山地帶及臺

---

32 韓尚儒，〈竹東發展與林業變遷（1940-1989）〉（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

33 李維修，〈消逝的逆旅：竹陽軒與塚迺酒家〉，收於韋煙灶主編，《從清代到當代：新竹 300 年文獻特輯》（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18），頁 207-227。

34 陳鸞鳳，〈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的發展〉，收於韋煙灶主編，《從清代到當代：新竹 300 年文獻特輯》，頁 391-407。

35 張怡敏，〈新高銀行與北臺灣茶業的資金流動：兼論桃園地區三支店的經營〉，收於李力庸主編，《經緯桃園：2018 桃園學》，頁 181-215。

三線一帶的資金得以進入國際金融網絡，成為世界經濟體系之一環。

李力庸的〈戰後桃園地區稻米的生產與流通〉，[36] 探討桃園原以稻作為主要的農作型態，如何的從備受期待到陷入危機，乃至轉型，最終成為十大經典好米的原因及其過程。

鄧宏旭的〈前進「南下第一站」：民國 80 年代桃園地區的住宅市場〉[37] 探討「都市外溢」對桃園住宅市場的影響，首先重建戰後初期桃園地區的都市狀況，分析民國 70 年代後期房地產狂飆對桃園的影響，以各項統計、報導分析民國 80 年代住宅市場的狀況與衍生問題，及政府的因應政策與結果，釐清住宅市場對桃園地區都市發展的影響。本文主張民國 70 年代一般民眾難以負擔大臺北地區的房地產價格，桃園的價格優勢吸引外人前來桃園置產定居，使得人口顯著成長。房地產熱潮也促成規避土地使用分區法令的「工業住宅」出現，桃園市僅次於新北市成為工業住宅次多的縣市，而該問題至今仍然未解。

從桃園學發展迅速來看，反映的是桃園先行研究的缺乏，這與桃園地區始終沒有出土重要的史料，以及較晚發展有關，[38] 不過因為桃園有許多重要建設，又是外來人口移居的主要城市，經濟蓬勃發展，足供研究者許多的課題，而桃園又為客家族群重鎮，因此在可預期的未來，區域研究與經濟相互結合，仍將會是桃園研究的一大主力。

（二）中部

黃儒柏的〈濁水溪下游糖業鐵路與地方經濟之發展（1907-1939）〉[39] 一文詳述該區域糖業鐵道的運作及收益情況，並兼論濁水溪經整治後出現的浮覆地作為移民村的情況，是一扎實的研究。但其研究區包含 17 個鄉鎮，也因此在論及地方經濟發展時，多只能概括性的介紹而無法詳究，這是本文美中不足之處。

---

36 李力庸，〈戰後桃園地區稻米的生產與流通〉，收於李力庸主編，《經緯桃園：2018 桃園學》，頁 217-251。

37 鄧宏旭，〈前進「南下第一站」：民國 80 年代桃園地區的住宅市場〉，收於李力庸主編，《經緯桃園：2018 桃園學》，頁 253-296。

38 陳家豪，〈建構中的「桃園學」研究〉，《臺灣學通訊》（新北）58（2011 年 10 月），頁 15。

39 黃儒柏，〈濁水溪下游糖業鐵路與地方經濟之發展（1907-1939）〉，《臺灣文獻》69: 1（2018 年 3 月），頁 123-172。

作者在 2019 年的另一著作〈戰後濁水溪下游糖業鐵道的重構、盤整與衰微（1945-1990）〉，[40] 透過戰後至糖業衰微的過程，指出 1970 年以前糖業仍具重要性，也因此能夠支撐糖業鐵路的運轉，然而隨著公路運輸的快速發展，糖業鐵路的缺點乃被放大，通勤人口快速傾斜至公路客運，加諸營運維修成本增高、卡車運輸的機動性高等因素，都使糖鐵無法支撐而退出社會。

韓正誼的〈南投地區輕便鐵道之發展與地方產業（1903-1936）〉，[41] 指出因南投地形的限制，使輕便鐵道業者須投入更高的成本，那麼業者的鋪設動機為何？答案是總督府為了理番而進行交通建設，以製糖及製腦兩項產業為基礎下所開展，其確實帶動了地方產業的發展及貨物運流的功能。而特殊之處在於當輕便鐵道於 1930 年代衰退之際，該區尚無大規模的公路運輸相競爭，主因仍是受到經濟衰退影響。在交通不便的南投，輕便軌道對產業擴充效益不如市場因素來的大，但對於地方經濟的發展，卻帶來極大的效益。

當輕便鐵路遇上公路運輸時，因為班次、機動性等因素而在競爭上漸趨下風，主導公路運輸地位的公營客運又是如何從獨佔到衰退？吳宗憲的《全臺縱橫：戰後臺灣省營公路客運之變遷》[42] 就嘗試解答這一問題，由於政策之故，公路局長期壟斷客運市場，但僵化的營運模式也在社會經濟改善後顯露出不支，民眾轉為支持更有效率的野雞車及民營客運，公路局雖屢屢提出改善，卻不獲政府支持而結束營運。

朱書漢的碩士論文以臺中火車站為主體，[43] 從車站的建構、變化來探討對周邊建築、聚落的深層影響。論文清楚地描述了臺中車站從建立至高架化的各項變化，但在部分議題的推論上則稍難釐清。如作者認為 SARS 的發生影響到臺中車

---

40 黃儒柏，〈戰後濁水溪下游糖業鐵道的重構、盤整與衰微（1945-1990）〉，《臺灣風物》69: 3（2019 年 9 月），頁 125-174。

41 韓正誼，〈南投地區輕便鐵道之發展與地方產業（1903-1936）〉（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42 吳宗憲，《全臺縱橫：戰後臺灣省營公路客運之變遷》（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9）。該書為作者的碩士論文，雖完成於 2017 年，然在 2018 年的經濟史或其他領域的回顧中並未被提到。作者於 2019 年改寫出版成書，對於公路客運的變遷加以重新梳理，對於交通史的研究仍有其價值，故予以回顧。

43 朱書漢，〈運轉臺中：臺中火車站與周邊設施之發展（1903-2017）〉（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8）。

站周邊的發展，但在 SARS 之時，臺中都市的發展軸線就已經逐漸轉移至西區了；且其他都市的發展軸線仍緊臨交通中心，若僅從車站及周邊的變化來看聚落發展，雖能看出依存關係，但市政發展、國家經濟政策、中部區域發展等更大的議題則難以從車站的發展看出，因車站的變化僅是政策施行下的一個縮影。

鐘大益的論文將織襪產業與社頭鄉的發展相互結合，[44] 作者雖是以織襪產業發展為主，但也論及了織襪產業對於社頭的就業人口、經濟情況、地景地貌所造成的影響。

（三）南部

有關南部的研究，2018-2019 年的研究多與高雄港有關。林丁國的〈內海忠司與高雄港擴建：以遷移海軍航空隊基地和建設工業地帶為中心（1935-1939）〉一文，[45] 跳脫以往高雄港研究的範疇，以時任高雄州知事內海忠司為切入點，探究他於任內期間，處理高雄港擴建與遷移海軍航空隊及規劃戲獅甲為工業地帶等各項事務。內海忠司及所屬的高雄州，對於重要政策，多僅能依令行事，但他同總督府與海軍之間的協調、折衝上，發揮其人脈及圓融的個性，加快了擴建的腳步；他對高雄發展工業的各項政策擘劃，也是使高雄於 1930 年代後逐漸成為工業大城的因素之一。

王御風的《舊港新灣：打狗港濱戲獅甲》[46] 一書，站在國家計畫經濟的視野來一窺區域發展的特性。從日治時期戲獅甲區域工業集聚的形成，再至戰後資源委員會一一接收企業後的發展，戲獅甲的發展與政府政策密不可分。而當民營企業興起、取代公營企業的地位後，民營化的浪潮也吹向公營企業，但民營化在經營不善及策略調整下，紛紛撤出戲獅甲。爾後，當地成為高雄亞洲新灣區，也是新產業的核心地帶。作者透過戲獅甲來闡明臺灣工業發展的軌跡，也指出當地作為計畫經濟下的產物，背後正是國家力量在牽動地方社會。

---

44 鐘大益，〈戰後社頭織襪產業發展之研究（1945-2005）〉（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

45 林丁國，〈內海忠司與高雄港擴建：以遷移海軍航空隊基地和建設工業地帶為中心（1935-1939）〉，《高雄文獻》（高雄）9: 1（2019 年 6 月），頁 7-29。

46 王御風，《舊港新灣：打狗港濱戲獅甲》（高雄：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新北：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

涂懿文的〈從歷史與空間觀點看高雄旗津當代的發展與變遷〉[47] 一文，也是從國家力量及空間政治的觀點一窺對地方社會的影響，並試圖解答何以旗津會步入衰退的問題。由於高雄港為臺灣第一大港，港區由中央政府治理，但作者指出，數次的空間擴張需求使旗津從關鍵且核心的貨品集散地逐漸的步入邊緣，而當地內部的產業也因國家整體規劃而支離破碎，如居民賴以為生的漁業即是。1990 年代後地方政府的權力增加，旗津卻仍是陷入發展的口號而被持續的切割。

從以上來看，區域研究的主力仍是以大學的碩士生為主，這些碩士論文因多具地緣關係，在觀點上較少跳脫在地觀察的侷限，缺乏從跨區域及國家發展的脈絡來討論，這是區域史常見的侷限。不過，從脈絡可以看出，部分的區域研究已經逐漸質變，開始跳脫出以往單純區域史的書寫模式，試圖尋找區域發展的主要變因，如數篇關於高雄的研究即是，更細緻化的加以操作，對於區域研究的發展而言，應屬正面。

四、產業史

在產業史的劃分上，有不少論著均具有區域史及產業史的成分，歸類上有其困難；又若以時代為基準，也難以對跨政權的研究有清楚的劃分，故採用農業、工業及商業、林業、電力與通訊等類別來區分，以下分別敘述之。

（一）農業

莊天賜的〈日治初期臺南地區製糖業之變遷（1895-1911）〉，[48] 延續他對糖務局的研究，探討治臺初期臺南地區糖業發展的歷程，作者將過程區分為四個時期，1904 年至 1911 年，新式製糖開始進入臺南，繼之總督府在臺南除設立試驗場外，也勸誘臺南仕紳投資，糖務局對於糖業的藍圖擘劃，也率先在臺南地區完成。

黃紹恆梳理龐大的公私藏檔案、報章雜誌等，從世界市場、殖民國家權力的

---

47 涂懿文，〈從歷史與空間觀點看高雄旗津當代的發展與變遷〉，《高雄文獻》8: 1（2018 年 4 月），頁 89-128。

48 莊天賜，〈日治初期臺南地區製糖業之變遷（1895-1911）〉，《臺陽文史研究》（臺南）4（2019 年 1 月），頁 43-72。

控制等宏觀面向，探討荷蘭時期到日治初期臺灣糖業發展的變化。該書指出荷蘭東印度公司時期為臺灣製糖業的發軔，至 1860 年代臺灣開港所出現的發展之「充分條件」，以及日本幕末開港引致的砂糖進口貿易赤字之「必要條件」，這些均促成臺灣近代製糖業的發展。日治初期的機械製糖業，雖然擁有優勢資本及生產技術，但卻無法克服原料問題，難以駕馭小農經濟體系，無法獨立於國家權力保護之外，成為糖業經營的難題。[49]

松浦章的《茶葉・香蕉・鰹節：日治時期臺灣農水產品的海外輸出》[50] 一書，彙集了作者近年來的論文，包括烏龍茶、包種茶、香蕉、水產品、鰹魚及鮮魚等，透過大量的日文文獻，包括船運公司的營業報告書，重探了早期臺灣農、水產品的輸出模式，該書除將輸出模式細緻分析外，亦能看出國外消費者對於臺灣物產的印象及態度。

洪紹洋探討 1937 年以前臺灣的黃麻和苧麻紡織業如何受到原料供應、市場競爭的影響，[51] 造成麻紡織無法維持一戰時的景氣持續成長。該文指出臺灣苧麻紡織事業的建立是在一戰的經濟榮景下進行的投資，但關鍵問題在於臺灣始終未能生產符合機械化生產的苧麻原料，須仰賴中國提供，故未能持續成長。

中國學者趙從勝〈近代殖民主義下臺灣與海南農業關係研究〉[52] 一文，探討日本在南進侵略過程中，臺灣所發揮的「臺灣經驗」。前進海南島雖為日本海軍所主導，臺灣也發揮農業專長積極派遣專家學者前往，如蓬萊米種植技術、三年輪作法等皆被複製，而各種物產也均移至海南種植。不過，作者雖羅列諸多技術及物種的移植，卻認為臺灣的農業成果在海南島中被保留下來的並不多，且未解釋何以如此，是較為可惜之處。

至於農產品的研究，王御風、黃于津的《鳳梨罐頭的黃金年代》[53] 一書，將日治時期臺灣重要的出口品：鳳梨罐頭，及如何在高雄發展、衰退的歷史變遷描

---

49 黃紹恆，《砂糖之島：日治初期的臺灣糖業史 1895-1911》（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2019）。

50 松浦章著、年旭譯，《茶葉・香蕉・鰹節：日治時期臺灣農水產品的海外輸出》（新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8）。

51 洪紹洋，〈臺灣麻紡織事業的興起與限制（1895-1936）〉，《國史館館刊》60（2019 年 6 月），頁 43-87。

52 赵从胜，〈近代殖民主义下台湾与海南农业关系研究〉，《台湾研究集刊》（廈門）163（2019 年 6 月），頁 73-81。

53 王御風、黃于津，《鳳梨罐頭的黃金年代》（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9）。

繪清楚。作者亦注重在官方統制經濟下的強勢力量是如何使傳統日商及臺商屈服，以及有鳳梨王國美譽的南部鳳梨罐頭業是如何走向衰敗之路。

（二）工業及商業

工業及商業的發展，是經濟史中的重要課題。日治時期工商業的發展，使臺灣產業結構有了新樣貌，其後雖受到戰爭破壞，在修復後並迎來高速發展，使臺灣邁入工業化社會。對於臺灣經濟奇蹟的推手究竟為何，持傳統中華民國史觀者多傾向於政府施政及技術官僚的作為，對於殖民時期所留下的遺產及民間企業所發揮的作用，並未有太高的評價。近年來，學界對於工商業的研究，不免須觸及兩個時代的價值判斷。因此對於戰後發展是延續自日治時期或始自中華民國政府有不少新的論述出現，陳慈玉、謝國興、洪紹洋、林蘭芳、瞿宛文等紛紛提出各自的觀點，是在「延續」或「斷裂」兩種觀點下所展開的討論，[54] 而 2018 年及 2019 年的工商兩業的著作亦多與此觀點有關。

陳家豪[55] 以近代交通業為例，探討跨政權的臺灣人資本如何在殖民經濟體之下，學習與仿效日本殖民者所引進的近代企業制度，以及如何以此累積資本與近代企業經營經驗渡過政經局勢混亂的戰時與戰後接收期，最終促成 1950 年代中期臺灣中小企業的蓬勃發展。作者運用公私藏檔案、民間文獻，結合歷史學及經濟學（包括會計學、管理學）的觀點及理論，詮釋臺人資本靈活運用盈餘保留與固定資產折舊為核心所構成的「資本核算」概念，得以適用快速變動的市場環境。

---

54 如陳慈玉，〈斷裂與連續：戰時到戰後初期臺灣重要軍需工業的變遷〉，《兩岸發展史研究》（桃園）7（2009 年 6 月），頁 145-189；陳慈玉，〈連續與斷裂：二十世紀的臺灣煤礦業〉，《新亞學報》（香港）27（2009 年 2 月），頁 53-101；謝國興，〈戰後初期臺灣中小企業的殖民地傳承〉，收於謝國興主編，《邊區歷史與主體性形塑：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頁 45-85；洪紹洋，〈戰後臺灣機械公司的接收與早期發展（1945-1953）〉，《臺灣史研究》17: 3（2010 年 9 月），頁 151-182；洪紹洋，〈軍需與民需的生產轉換：終戰前後臺灣兩次硫酸錏工廠的創辦〉，《臺灣史研究》25: 3（2018 年 9 月），頁 141-178；林蘭芳，〈戰後初期資源委員會對臺電之接收（1945-1952）：以技術與人才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9（2013 年 3 月），頁 87-135；瞿宛文，〈臺灣戰後工業化是殖民時期的延續嗎？兼論戰後第一代企業家的起源〉，《臺灣史研究》17: 2（2010 年 6 月），頁 39-84；瞿宛文，〈戰後臺灣經濟成長原因之回顧：論殖民統治之影響與其他〉，《臺灣社會研究季刊》（臺北）65（2007 年 3 月），頁 1-33。

55 陳家豪，《近代臺灣人資本與企業經營：以交通業為探討中心（1895-1954）》（臺北：政大出版社，2018）。

他的另一篇著作，[56] 指出在日治時期因桃園及大溪間的人口增加，桃崁輕鐵欲推動電車計畫，並建立一間民間電廠來供其發電。在臺北市，實業家也欲利用新店溪的水力來發電，不過官方對於發展電車計畫始終認為應由官方主導。即使是在日本本土，電力建設也始終無法跟上社會經濟發展。陳氏認為，地方仕紳在軌道建設上，是抱著開放的態度，甚至亟欲複製殖民母國的經驗。

曾令毅則從航空產業切入，〈近代臺灣航空與軍需產業的發展及技術轉型（1920s-1960s）〉[57] 跳脫以 1945 年為論述的起點，清楚描述出從一次大戰後日本致力於航空產業的發展，及至 1960 年代臺灣在航空事業中所累積的軍工產業實力和民間資本所累積的過程這一路徑。並指出由中國所帶來大量的空軍人才固然為產業的主力，但民間資本在殖民時期所累積的技術，加上與黨政軍的良好關係，也是整個航空產業得以在擴大中成為不可或缺的要角，並足以影響日後的經濟結構。

洪紹洋則探討硫酸錏業，由於製造硫酸錏的氨原料能轉換為製造火藥所需的硝酸，故具民需與軍需的特性。[58] 作者以日治末期和戰後初期兩間工廠的設立來討論「軍需—民需」之間的轉換，在末期設立的臺灣窒素（氮）會社，在尚未開工生產硫酸錏下就直接轉變為生產火藥以供軍需。戰後卻未受資委會的青睞，而是直接被整編入臺灣工礦公司進行民需火藥的生產，也無意在臺生產硫酸錏。當中國大陸淪陷後，為農業發展考量，乃在高雄設立高雄硫酸錏廠，初期運作多數均由中國來臺的軍方人員調派，與其他的公營事業不同，整體發展則因肥料換穀的推動而有所成長。作者的貢獻在於描繪出軍需與民需的生產連結關係中，國家介入的力道之強，但亦指出，此時期的經濟應視為特殊現象，而非典型的經濟發展過程。

洪紹洋的另一篇文章，為〈外資、商業網絡與產業成長：論出口擴張期臺灣的日資動向〉，[59] 有別於既有研究著重戰後臺灣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成長，中小

---

56 陳家豪，〈桃園前瞻軌道計畫的前奏曲：1910 年代桃園——大溪的電車計畫〉，《桃園文獻》（桃園）5（2018 年 3 月），頁 41-62。

57 曾令毅，〈近代臺灣航空與軍需產業的發展及技術轉型（1920s-1960s）〉（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8）。

58 洪紹洋，〈軍需與民需的生產轉換：終戰前後臺灣兩次硫酸錏工廠的創辦〉，頁 141-178。

59 洪紹洋，〈外資、商業網絡與產業成長：論出口擴張期臺灣的日資動向〉，《臺灣史研究》26: 4（2019 年 12 月），頁 97-141。

企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較少著墨外資的貢獻，該文詳實考察 1960 年代起臺灣在出口擴張階段時期的來臺日資與本地資本相連結，促成臺灣的產業升級與促使資本家經營型態改變。

臺灣的化學工業在經濟發展中也極為重要，然由於專業門檻及龐大的產業體系，該業的發展史始終未有太多著述，故 2019 年由黃梧桐主編的，《臺灣合成樹脂產業發展史》一書，即有其重要性。該書由長興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職員黃梧桐等 12 位員工合著，分為合成樹酯、不飽和聚酯樹酯、醇酸樹脂、飽合聚酯樹脂、酚醛樹脂、氨基樹脂、丙烯酸樹脂、壓克力感壓郊樹脂、紫外光固化材料、電子光電產業用合成樹脂等章，每篇簡略提及產業發展，也力求簡化專業內容，以供一般讀者能對該產業有更多認識。[60]

（三）林業

在林業史上，由於生態及保育觀念的推動，以及林業相關檔案的開放，使林業研究快速累積，2018 年王鴻濬《森林、部落、人：太魯閣林業史》一書可視為是他在 2016 年的《1922 年無盡藏的大發現：哈崙百年林業史》的第二部曲，該書除介紹太魯閣林場的設立與營運外，也追溯了太魯閣森林裡的部落及歷史傳說，以及在林場工作員工的生活。作者希望傳遞給讀者的，並非僅是林業史的研究，而是森林與人類的共生依存，以及大自然的和諧之道。

洪廣冀的〈從「臺灣之恥」到「發展最速的產業」：再思日治時期臺灣的科學林業與工業化〉，[61] 雖是探討林業劇烈轉型的過程，但更深層的目的是結合臺灣林學者與歐美林學者所各欠缺的部分：臺灣林業史長期側重脈絡的分析，如資本主義化與原使積累，卻失於打開科學林業這一黑箱；歐美林業史關注環境史與政治生態學的研究趨勢，重視殖民林業的治理性，並打開科學林業黑箱，卻忽略了治理性所座落的政治經濟脈絡，即經驗的處理為「科學林業所服務」的殖民統治或殖民地之於母國的依賴發展。該文除大量使用《臺灣總督府時期林業檔案》，也使用了尚少人利用的《森林計畫事業相關檔案》，作者論證了臺灣林業從落後到

---

60 黃梧桐主編，《臺灣合成樹脂產業發展史》（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化工史料館；高雄：長興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2019）。

61 洪廣冀，〈從「臺灣之恥」到「發展最速的產業」：再思日治時期臺灣的科學林業與工業化〉，《臺灣史研究》25: 3（2018 年 9 月），頁 83-140。

發展快速的過程：林業低度開發與落後的制度，難以讓臺灣林業自給自足，因此林業部門思考將天然林換成人造林。故作者認為，1920 年代林業單位所宣稱的森林保育觀，不是單純的保育天然林，而是在伐木與造林之間達到永續平衡，而這有賴於資本進入林業才有可能，並有 1930 年代臺灣林業飛快之發展。

另外，羅時承的〈阿里山森林鐵路的身分價值變遷：從殖民產業到國家級重要文化景觀〉[62] 除指出阿里山林業的發展與森林鐵路的關連外，在阿里山林業逐漸退去重要性時，阿里山森林鐵路卻因為其自身品牌而得以被保存下來，並成為臺灣重要的文化遺產。

許淑娟的〈日治初期高雄平原區低丘的林野開發〉，[63] 可說是結合林業、區域與產業史的論著。高雄的歷史開發有幾點特性，一是開發極早，二是清末及日治，國家力量極大型塑現今之高雄，也因此研究者多關注於此，卻忽略日治時期市街之外的林野開發。丘陵地林野開發重點，在於林產物石灰石，因此吸引日臺商人的競相爭取。作者指出，官方核准與否的考量條件在利權舊慣、水土保持、水源涵養、風土景觀、申請順序、價格高低、資歷財力等，也避免同一地被同一業者過度壟斷，因此日臺商人並未有明顯高低，而這些因素考量下的實施，正是其後高雄地區山丘風光不同的分水嶺。

（四）電力及通訊

日治時期臺灣電力建設逐漸普及，為各業發展帶來基礎；加上海底電纜的鋪設，臺灣與世界的連結更為緊密，由此可知電力與通訊對於整體社會之重要性。有關電力電業的研究，由於 2016 年時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臺電公司」）進行文物資產保存運維專案，以先典藏研究，後展示教育為方針，因此 2018 年及 2019 年，為電力研究的豐收年，臺電公司優先以竹仔門電廠、舊東西線、濁水溪及大甲溪流域水力發電等四大主題來進行，故 2018 年時其贊助出版的四本論著，分別是林欣誼與陳歆怡的《古道電塔紀行：舊東西輸電線世紀回眸》、[64] 陳

---

62 羅時承，〈阿里山森林鐵路的身分價值變遷：從殖民產業到國家級重要文化景觀〉（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碩士論文，2019）。

63 許淑娟，〈日治時期高雄平原區低丘的林野開發〉，《高雄文獻》9: 2（2019 年 12 月），頁 33-71。

64 林欣誼、陳歆怡，《古道電塔紀行：舊東西輸電線世紀回眸》（臺北：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

佳德、傅希堯《傳說：竹門秘境 微光往事》、[65] 臺電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 川流不息》、[66] 李瑞宗《大甲溪：水電俱樂部》[67] 等。四書為文史資料清查的成果，均蒐羅數量眾多的舊照片、檔案、構造圖及現地照片等。而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眾多的員工或家眷，或曾居住於此的住民均參與其中，透過口述訪談內容增色不少，此四書除可供讀者了解臺電的發展之外，更是民眾、產業、社區所交織一體的生活史。

2019 年，臺電公司又陸續出版由王舜薇、張瓊方、陳歆怡合著的《文明初來電：新店溪水力發電百年記》[68] 以及李瑞宗的《後山電火：東部水力發電》[69] 二書，前者講述新店溪上下游的各個電廠的設立及特色，以及電廠員工與當地社會的互動。後者講述的是東部的水力發電之開發，作者透過親身走訪紀錄，帶領讀者進入早期開發的艱苦及臺電公司人員在此地的歷史過往，為早期電力事業的研究增色不少。

劉芷瑋的《交通、人流、物流：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對於水里地區的影響（1919-1945）》[70] 一書，試圖將日月潭的水力發電與區域研究相結合，由於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的論著已有不少成果，故本文的價值應是在水力發電工程影響下的交通建設與人流、物流的影響，受惠於先導交通建設及主要工程的推動，帶來大量工人及水庫移民，而交通網絡又讓物流暢通，各式商家也匯集於此，帶動水里的發展。本文從工程或政策的角度來詮釋發展的要因，有別於前人電力研究或區域研究的脈絡。

在通訊事業的研究上，有兩本重要著作，吳政憲關注到當臺灣步入近代化的過程中，通訊設備為與日本最重要的溝通手段，而工商業之經營，又與日本息息相關，因此作者先論述了海底電纜的發展與通訊全球化，接著對臺灣與沖繩之間的沖繩、長崎與淡水之間的長淡一號線及二號線的規劃及營運、維護進行探討，

---

65 陳佳德、傅希堯，《傳說：竹門秘境 微光往事》（臺北：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

66 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濁水溪：引水成電 川流不息》（臺北：該公司，2018）。

67 李瑞宗，《大甲溪：水電俱樂部》，（臺北：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

68 王舜薇、張瓊方、陳歆怡，《文明初來電：新店溪水力發電百年記》（臺北：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9）。

69 李瑞宗，《後山電火：東部水力發電》（臺北：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19）。

70 劉芷瑋，《交通、人流、物流：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對於水里地區的影響（1919-1945）》（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8）。

最後分析海底電纜對社會之影響。[71] 作者指出，工商業的快速發展，與日本保持快速且優良的通訊品質是至關重要的，而電纜也使臺灣能夠與日本乃至世界快速的連結，因此當臺灣接觸了現代化通訊所帶來的便利後，反而是官民各界對於增建新的設備需求若渴。因此，在殖民現代性下，殖民地也非被動接受殖民母國的事物，反而是積極地邁向現代化。

曾立維的博士論文〈近代通訊與殖民地臺灣：以電報、電話為中心〉[72] 將重心放在電報電話的流通及運用。作者指出臺灣社會與官方之間對於布置電話的需求有所落差，總督府對於布置電話的速度與態度始終無法符合民間需求，因為總督府的初衷乃是基於統治考量下來布建的初步全島通訊網，當與朝鮮、日本等地的通訊網建置後，改善提高通訊品質就非急切的要務。作者比較了臺灣對於電報和電話之間的使用及差異，透過島內報紙的編成，指出由於遠洋電話此時的技術侷限，臺日兩地的通訊仍以電報為主，而臺灣本地以電話為主，兩者形成互補，而透過報紙在全島的發行，使島內人民產生了意識上的共通性，此意識的共通性且具有一定規模的社會統合，這是近代通訊對於臺灣為一體性統合現象形成的貢獻。

五、飲食、消費及遊憩

近年來，消費與飲食文化的研究方興未艾，消費文化可說是一項產業的終端，產業如何形成、交易，再至消費者手中，不僅可看出相關產業發展，也能一探臺灣如何透過消費、飲食，被納入全球市場的範疇之中。鄭維中關於烏魚、土魠及虱目魚的研究，從早期臺灣史的角度切入，探究這三種魚類如何進入臺灣並成為主要的消費魚種。該文的主要貢獻是透過「異地漁業」與「本地漁業」的概念，釐清並重建早期漁業發展中漁民移動的模式。[73]

---

71 吳政憲，《帝國之弦：日治時期臺日海底電纜之研究（1895-1945）》（新北：稻鄉出版社，2018）。

72 曾立維，〈近代通訊與殖民地臺灣：以電報、電話為中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8）。

73 鄭維中，〈烏魚、土魠、虱目魚：多元脈絡下荷治至清領初期臺灣三種特色海產的確立〉，《臺灣史研究》25: 2（2018 年 6 月），頁 1-60。

林玉茹關於清末臺灣海產消費的文章，[74] 則全面性介紹臺灣海產，並分析南、北兩地對於海產的需求均是進口大於出口，但南部進口的項目更多且繁，顯示南部民眾對於海產的喜好與消費文化，也反映出傳統紳商家族的喜好；該文也反駁了長久以來許多研究者認為清代臺灣漁業落後的刻板印象，臺灣的漁業技術其實並不亞於歐洲，之所以發展不如農業，乃是重稅下的結果。而透過海產進出口，臺灣已是國際海產市場分工與貿易不可或缺的一環。

人群移動與區域開發的程度，會直接影響飲食模式及習慣，外來移民會帶進原鄉的飲食。然而，飲食模式的建構，尚賴於自然環境與人口的需求，且也會持續的變形，陳玉箴對於澎湖的研究，就試圖由環境、軍事需求及移動人口三個要素的影響來探究澎湖餐飲業的歷史變遷。[75] 作者提出的「島嶼型食生活」不僅是菜餚，「而是經驗、知識與技藝累積，在食物上從生產、製作到食用上所建立起環環相扣的鏈結」。澎湖的自然環境險峻，農業資源極度匱乏，島上居民或半農半魚，或島外出稼。由於戰略地位之重要，龐大的駐軍也撐起型式不一且菜色各異的餐飲消費市場；戰後大量的觀光客（短期移動人口）又再一次影響島上的飲食，原先的大陸菜館逐漸轉為面向觀光客的海鮮餐廳。作者提示我們，不同的小型島嶼，極容易受到這三項要素的影響而發展出不同的特色。

飲食模式既會受到環境與人流移動的影響，也會受到政治影響，曾品滄對可口可樂如何於臺灣發展，從美國文化在全球的推展及國民黨政府禁令兩個角度切入討論。[76] 可口可樂風行全球，表面上是跨國公司業務之拓展，實質是美國文化伴隨著美軍駐紮全球各地而進入的一種象徵，但在臺灣，政府維持禁令至 1967 年，理由在於上海經驗的恐懼和對國民進行消費管制，以及保護飲料工業。不過禁令雖在，卻始終無法阻絕可口可樂流通於市面上，原因正是官民對於美國消費文化的想像與嚮往，因此 1967 年的開放，正是考量跨國公司的壓力及黑市所造成的稅收短缺，並寄望能刺激消費欲望及擴張經濟動能後，其他的消費性產品也隨之而來。儘管開放時程遠緩於其他民主陣營國家，但也象徵臺灣邁入新的消費

---

74 林玉茹，〈進口導向：十九世紀臺灣海產的生產與消費〉，《臺灣史研究》25: 1（2018 年 3 月），頁 39-100。

75 陳玉箴，〈環境、軍需、移動人口：澎湖餐飲業歷史變遷與「島嶼型食生活」研究〉，《臺灣史研究》25: 3（2018 年 9 月），頁 1-42。

76 曾品滄，〈美國的滋味：冷戰前期臺灣的可口可樂禁令與消費（1950-1967）〉，《臺灣史研究》26: 2（2019 年 6 月），頁 113-150。

文化，同時飲料工業得以藉此汰除體質不佳的工廠而更加茁壯。

遊憩與旅遊史的書寫，是近幾年來逐漸興起的一股研究趨勢，特點在於利用大量的旅遊文本，從撰者的見聞一窺風土民情、歷史人文，可說是區域研究的新路徑。吳政憲《檜林、溫泉、鐵線橋：近代八仙山林場的成立與旅行書寫（1910-1930）》[77] 一書的核心問題是，八仙山林場從 1910 年成立不消數年，即獲得臺灣八景殊榮，何以在戰後的旅遊地點中，八仙山長久以來被遺忘？作者介紹八仙山林場的成立、人力配置及營運過程，也透過日本人所留下的旅遊文本分析八仙山的美景，彌補八仙山的樣貌，作者實地走訪對比今昔變化，希冀做為未來活化八仙山歷史樣貌的文本。而八仙山在 1930 年何以沒落至今，則提及的力度較少，是美中不足之處。

六、環境與社會經濟變遷

李文良利用清代契約文書，配合文獻與田野，探討臺江內海東北方鄰近岸際的「港口地區」（今臺南市安定區）之庄民如何面對劇烈的環境變動。[78] 該文指出港口庄民面臨的嚴峻挑戰，除了自然環境與維生方式的急遽變遷，還有與鄰近村庄間的資源競爭。港口庄民的菁英們透過尋求官府庇護，成為臺灣道衙門的收租地，藉以強化抵抗周邊強大村落以及府縣等衙門資源爭奪的能量。

在河流的研究上，臺灣的河流多短且急促，一次改道就可能對當地造成影響，因此研究者多關注在河流的改道變化，以及河流改道後對於地方經濟的影響。內田勣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史學科中的地理學專攻，1934 年來臺後於今臺南二中教授地理，直至 1940 年才回日本。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翻譯內田勣的〈曾文溪的河道變動與聚落及耕地的關係〉[79] 一文，指出作者關注曾文溪的氾濫後是否會出現尼羅河現象，作者指出曾文溪有幾點特點：一是從夏季開始水量增加，冬季時

---

77 吳政憲，《檜林、溫泉、鐵線橋：近代八仙山林場的成立與旅行書寫（1910-1930）》（新北：稻鄉出版社，2018）。

78 李文良，〈積泥成埔：清代臺江內海「港口濕地」的築堰與認墾〉，《臺灣史研究》26: 3（2019 年 9 月），頁 1-37。

79 內田勣著，林淑芬譯，賴品蓉、陳怡菁、陳怡宏導讀，陳怡宏、陳怡菁校注，〈曾文溪的河道變動與聚落及耕地的關係〉，《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15（2018 年 5 月），頁 167-188。

水量減少；二是每年沖刷土沙下來；三是冬天氣溫適合耕作；四是可在河床上耕作。作者言：「光看這幾點，不論是誰都會將曾文溪聯想成尼羅河吧。」作者雖是一地理學者，但更關注地方居民的經濟情況，尤其是河川整治或氾濫後出現的耕地種植情況及收益。就整體而言，該文的價值在於作為第一手史料的真實性。

陳鴻圖的《人物、人群與近代臺灣水利》[80] 一書，由歷史來考察「人—水利—環境」的關係，該書除〈臺灣の水利〉和〈水利通訊〉的書寫比較，還探討了三位重要的水利人物，包括研究清代臺灣農村及水利史的王世慶、水利技術官僚的八田與一及徐世大。其中八田與一及徐世大更代表不同政權對水利開發的態度；另外在人、水利及環境的變遷上，以東部為考察場域，指出過去臺灣對待水及水利的態度，只重視經濟，過度開發，人、地、水的關係日漸疏離，乃因此提出反思。

在中國大陸關於臺灣的研究上，林文凱在 2012 年至 2015 年的回顧中提及，相對於臺灣及日本經濟史學界對於日治時期經濟史與戰前戰後經濟關聯議題上的修正，中國學界對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的研究也在快速累積中，問題意識也從原先的單純批判殖民掠奪與侵略，開始轉向對臺灣學界所謂殖民現代性的批判，否定臺灣經濟在日治時期兼具殖民性與近代性的殖民現代化，也不承認戰後臺灣經濟發展與戰前殖民地遺產的延續關聯。2015 年中國學界所舉辦的「紀念抗戰勝利與臺灣光復 7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並在 2019 年所出版的《近代臺灣史研究的新進展》上、下兩集中，也仍能看到部分作者的史觀仍抱持上述的看法，[81] 在目前兩岸政治持續緊縮的情況下，政治如何影響學術，應當持續關注。

七、研究觀察

就筆者淺略之觀察，經濟史在經濟政策的課題上，由於須具備較為全面的觀

---

80 陳鴻圖，《人物、人群與近代臺灣水利》(新北：稻鄉出版社，2019)。

81 如李博強的〈管理、法规与资本体系的重构：甲午战后日本对台湾盐政的殖民化改造〉，結論言：「……部分學者在研究臺灣鹽政時，受政治現狀影響，對日據時期鹽專賣制度的歷史性質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刻意淡化或模糊對此問題的認識。毫無疑問，僅僅對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進行分析的話，只是『就事論事』，並沒有做到『論從史出』，更無法實現『以史為鑑』的目的。……」收於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編，《近代台湾史研究的新进展：纪念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 7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頁 690。

察視角，跨學門的素養成為一定的條件，因此一般的碩士生在選題時，較常選擇的多是區域史與產業變遷，此類課題因有著較多且明確的統計數據做為基礎材料而受學生青睞。消費文化的範疇極廣，上由國家政策，中至產業現況，下至個人經驗均可延伸，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飲食習慣背後的文化流動更顯重要，配合越來越多的個人日記史料出現，如 2019 年所出版的《吳墉祥在臺日記》，內容雖以他個人就職於金融界時的各項經歷為主，但對於戰後的糧食配給亦有不少紀錄。這些都在在使消費文化的研究更具史料基礎。不過此類議題，由於須要有文化史的基礎，在史料的應用上也更為細膩而多元，較難成為碩士研究生的課題。

從歷次的經濟史回顧觀之，區域與產業的研究仍未有衰退的趨向，一方面，研究基礎日益累積下，早期僅以區域史社會變遷的課題已難再滿足研究者，對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視成為此類研究的必要條件。如林玉茹對東臺灣的考察；如陳凱雯從殖民地母國、殖民地政府的不同角度來看基隆港築港政策的推動，跳脫單一殖民地的史觀，由帝國的框架往下觀之，基隆的變遷僅是她考察帝國築港政策下的例證：而族群與經濟的關聯也被研究者注意；如陳志豪就長年關注北臺灣山區的族群的生產、消費及流通等。[82]

在統計資料的運用上，統計數字是經濟史研究的基礎，隨著 GIS 的運用，對於區域及產業史的研究，有其深化的助益，如人口分布及統計、生活空間、水利設施等，前人研究均已提及可運用範圍，[83] 隨著統計資料更為多元，GIS 的使用範疇也就越大，地區產業營收的展現、工廠分布等，均已被運用在區域經濟的研究中。

傳統的研究課題漸漸轉化，如林文凱與李佩蓁兩位就指出在清末臺灣官方角色不如先行研究認為具有強制或獨斷的能力，正是沒有獨立且有效監督的科層官僚體系存在於臺灣，官員仍慣於同紳商合作，這是國家控制力無法有效發揮的原

---

82 陳志豪，《清代北臺灣的移墾與「邊區」社會（1790-1895）》（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2019）。此外尚有如賴玉玲的〈客家族群的遷徙與經濟發展：以新竹關西與高雄美濃地區為例〉，收於俞龍通主編，《客家文化產業生成與發展》（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2019），頁 57-105；張維安與張志宇的〈土地、族群與經濟活動：中港溪與後龍溪流域的客家經濟特色〉，收於俞龍通主編，《客家文化產業生成與發展》，頁 27-55；張瀚壁、黃玫瑄，〈客家移民、文化與經濟生活：以池上地區為例〉，《臺灣風物》68: 4（2018 年 12 月），頁 137-165。

83 如李宗信、顧雅文，〈近二十年來應用歷史地理資訊系統的回顧與展望：以臺灣區域史研究為例〉，《臺灣史研究》21: 2（2014 年 6 月），頁 167-196。

因，也是清代末期臺灣仍不具備近代化發展內涵的主因。對於清代末期臺灣的統治議題，或是傳統的積極治臺論點，仍有許多研究的空間。而如早期對於土地改革研究，長期被定調為農業發展的成功因素之一。約在 2010 年後，對土地改革的反思快速成長，不同的觀點擴大了研究視野及觸角，如市地重劃、農地重劃或公營事業的影響均是。不過，此類課題的史料運用，除徐世榮運用較多的口述訪談外，其餘的研究者多仍集中在檔案文獻。戰後的經濟史研究，對於口述歷史的運用仍嫌不足，如筆者就工作所觸及的農村耆老訪談，對農業政策的評價即與官方有其落差，這些均是史料檔案鮮少呈現的面相，若能嚴謹且審慎的應用，當可為戰後經濟史研究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一）政府對地方學的推動及推力

近年來，由於文化意識的快速提高，地方政府開始正視地方歷史書寫，尤其是桃園、高雄，在升格六都後，對文化資產更為注重，如《高雄文獻》於 2011 年創刊，[84] 《桃園文獻》於 2016 年創刊。以《桃園文獻》為例，至 2019 年末，共出刊 9 期，各期均有主題，據筆者的分類，可歸於經濟史範疇的共有 9 篇，其中工商交通各業有 5 篇，環境、水利 2 篇，飲食消費 1 篇，區域發展 1 篇，以出刊三年的時間來看，這樣的績效著實可觀。《桃園文獻》的另一個特色是針對桃園地區的各業名人或耆老進行口述訪談，如交通業、水利會、產業部門的官員等，透過建構、累積口述歷史，留下各業的從業者記憶。《高雄文獻》至 2019 年末，約累積了將近 47 篇經濟史範疇的文章，其中區域史 15 篇，農業史 2 篇，工商製造業 10 篇，林業 1 篇，飲食及消費 13 篇，環境水利 6 篇，這樣的成績令人注目，地方文獻的推動在取得亮眼成績時，其隱憂也逐漸地出現。

地方文獻的隱憂是多會面臨稿源不足的困境，如《高雄文獻》在 2011 年至 2013 年都維持一年四期的標準，2014 年起改為一年三期的旬刊，2019 年起則改為一年兩期的半年刊，已與其他縣市一致。地方文獻的任務是推動地方研究、保

---

[84] 《高雄文獻》的前身係有二，一是自 1979 年起，由高雄市文獻委員會發行的《高雄文獻》，該刊發行至 1988 年，其後改名為《高市文獻》，直至 2010 年止；二是 1980 年由高雄縣政府所發行的《高縣文獻》，同樣發行至 2010 年。2010 年高雄縣市合併為高雄市，乃由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於 2011 發行《高雄文獻》至今。

存地方文獻，兼具學術研究和文獻蒐集的功能，讀者群除是學術工作者外，更面向市民大眾。地方文獻的論著來源，不外是學術工作者和地方文史工作者，但在現行的 SSCI、TSSCI、THCI Core 制度下，學術工作者多會投稿具點數的刊物以利晉升，在稿源缺乏的情況下，地方文史工作者及在地大學的研究生遂為主要的稿件來源。

以目前的評比制度觀之，僅有《臺灣文獻》列為第二級刊物，其他的地方文獻均未列級，蓋《臺灣文獻》面向全臺灣與文獻相關之理論、史料、田野調查、訪談等，稿源基礎本就大於縣市層級的文獻會。縣市層級的文獻刊物要能維持研究能量，在地大學中的人文科系就至關重要，如桃園的國立中央大學，高雄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宜蘭的國立宜蘭大學及佛光大學，澎湖的國立澎湖科技大學等……這些大學的教師及研究生因具地利之便，與地方的連結性較深，是區域史及在地產業史研究的主幹。而區內若具有顯著的研究目標，如高雄港市，桃園的家族、水利及工商業，更有助於擴展區域研究及持續提供研究課題。

但如前所言，地方文獻仍有稿源不足的問題，因此除研究論著外，各刊物均有屬於自身的出版策略及特色，如《桃園文獻》每一期均有三至四篇的人物訪談紀錄，透過在地人物的口述，以建構地方的歷史記憶；《高雄文獻》則收錄文化局歷年所舉辦的「高雄小故事」中的市民投稿，以擴大市民投入地方歷史的保存。然地方歷史在建構的過程中維持嚴謹的學術性是避免地方學淪為鄉野奇談的必要原則，研究論著的持續產出仍是關鍵之所在，如何鼓勵學術工作者願意投入地方文獻，應是未來學界及主管機關須加以思考的問題。

而由教育部所主辦，於 2017 年試辦、2018 年正式執行的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USR），以大學的專業領域結合在地社會、產業，協助在地產業發展及升級，鼓勵師生進入社區傾聽在地困境，協助改善、提升在地產業價值。在過程中，大學須與在地組織保持密切合作才有可能成功。如國立成功大學推動的「惡地協作：淺山地區之區域創生與跨域實踐」計畫，整合該校五院九系的力量，對南臺灣淺山地區進行調查，同時藉由課程來培育新的在地力量。該校歷史學系與當地文史工作者合作，透過課程的田野調查引領學生認識地方。其成果於 2021 年 1 月發表為《高雄市田寮區文史調查論文集》一、二集，其中如曾子容的〈高雄田寮地區的經濟生活初探：以竹製品為例〉、林欣楷

的〈從化外之地到國土保護區：田寮百年的產業變遷〉、黑羽夏彥的〈日本殖民政策對臺灣山村地區的影響：龍崎及田寮為事例〉等均屬經濟史範疇；[85] 而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協助社頭織襪產業的創新創生，也由該校歷史所負責調查織襪產業的歷史部分，這些論文或許仍僅是初步的學生實作或是研究報告，但亦是經濟史培育的基礎之一。因此，由大學執行的 USR 計畫，對於區域史、產業史的助益應是值得期待的。

（二）新史料的出現

史料是歷史研究的根本，而公部門或許是未來新史料得以問世的一大力量。公部門近年來積極推動歷史遺跡修復、社區再造、產業調查或研究計畫，也釋放出更多的史料，如高雄鳳山地政事務所於 2017 年與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合作清點、整理，從中發現約 1,800 餘冊、超過 15 萬頁以上的龐大史料，由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陸續進行典藏及數位化工作。該館並從中挑選有關於左營及鐵道部分的史料，集結出版《鳳山地政檔案彙編：左營舊城驛及鐵道篇》一書。該批史料含有土地臺帳、地目變更紀錄、制度公證書、不動產登記共同擔保帳等各類土地文書，舉凡境內的土地、建物、商業、工業、教育機構、民政等土地登記均有涉及，將是日後研究日治時期高雄及屏東土地利用問題上不可或缺的史料。

此外，2017 年高雄市政府進行「六龜之心再造計畫」，對六龜街區的歷史建築進行整修，並於 2018 年 1 月由該市都發局及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在六龜的稛源商店發現大量文物，初步盤點後，含帳冊資料、個人文書、照片文件、圖書筆記等多種類別，將之區分為「稛源商店六龜支店史料」及「洪家家族」兩種；2019 年 5 月又發現該商店的其餘文書帳冊，經過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的盤點，在不含 2019 年 10 月所取回的資料下，就有 1,576 件文書文物。該史料對於了解高雄山區蕃產交易及六龜地區的歷史變遷有極大的助益，亦是近年來少見的關於區域開發、家族文書及交易帳冊等大量的史料。[86] 該批史料在家屬同意捐贈後，由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進行保存處理及數位化，俟日後開放時，對經濟史的研究將更有助益。

---

85 呂自揚，〈詩寫臺灣：喜見成大歷史系田寮月世界的文史調查〉（2021 年 2 月 22 日），《民報》，下載日期：2021 年 9 月 24 日，網址：https://www.peoplenews.tw/news/91ee46bd-838b-4bfa-b0ca-18daf3c64f56。

86 莊建華、余姿慧、曾子容，〈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稛源商店六龜支店暨洪家家族文書史料介紹〉，《高雄文獻》9: 2（2019 年 12 月），頁 138-158。

八、結論

2018 年至 2019 年的經濟史仍具一定的研究能量，碩士研究生仍為研究大宗，由區域研究入手，進行地方產業的研究，並勾勒對地方社會的影響，佐以 GIS 等技術的輔助，是不少碩士研究生的選擇。因此從短期趨勢來看，區域史及區域產業史仍占主要地位，而傳統的經濟政策、政治經濟史等研究，仍占少數。另外，傳統研究課題已逐漸轉化，取而代之的是跨領域、複合式的研究課題，如飲食文化、消費習慣、環境保護等原先被認為屬文化史範疇的熱門議題均出現與之相關的經濟史研究，研究領域的延伸也帶入新的史料，但是否可能會出現研究領域難以被歸納，或經濟史逐漸從屬於社會史、文化史、環境史之中，後續須加以觀察。

公部門在可預期的數年內將是經濟史的重要推力。政府宣布 2018 年為臺灣地方創生元年，將「地方創生」定位為國家安全戰略層級政策，以人為核心，復興地方產業，創造就業人口，促進人口回流，並透過對地方文化、歷史的再認識，結合地方特色產業，形塑足以經濟自足的產業環境，這也是使地方重新檢視在地產業經濟的契機。而各地區大學推動的 USR 計畫，亦與地方創生有切合之處，因此在地經濟研究的熱潮應仍能維持一段時間。而地方政府積極推動地方學的發展，地方文獻的推動為必要基礎，如《高雄文獻》、《桃園文獻》、《臺北文獻》、《宜蘭文獻》、《硓𥑮石》等刊物，也為經濟史研究持續注入新的活力。

公私部門在文化資產保存的意識下，積極盤點、清查文史檔案，並進行自身企業史的書寫，不僅能有效發掘機關內部檔案，提高機關保存檔案之意願，更能為將來的經濟史研究積攢更多豐富的史料；而企業近年來熱衷於公司史或產業史的編寫，對整體的研究環境有其正面效益。惟如何吸引更多的企業投入，認知企業史的書寫乃為企業永續經營之基礎，並促其公開研究成果供社會認識、使用，而非是束之高閣，則有賴學界與業主的更多溝通與交流。

引用書目

呂自揚，〈詩寫臺灣：喜見成大歷史系田寮月世界的文史調查〉（2021 年 2 月 22 日），《民報》，下載日期：2021 年 9 月 24 日，網址：https://www.peoplenews.tw/news/91ee46bd-838b-4bfa-b0ca-18daf3c64f56。

內田勣（著），林淑芬（譯），賴品蓉、陳怡菁、陳怡宏（導讀），陳怡宏、陳怡菁（校注）

2018 〈曾文溪的河道變動與聚落及耕地的關係〉，《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臺南）15: 167-188。

王御風

2018 《舊港新灣：打狗港濱戲獅甲》。高雄：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新北：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王御風、黃于津

2019 《鳳梨罐頭的黃金年代》。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王舜薇、張瓊方、陳歆怡

2019 《文明初來電：新店溪水力發電百年記》。臺北：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朱書漢

2018 〈運轉臺中：臺中火車站與周邊設施之發展（1903-2017）〉。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吳宗憲

2019 《全臺縱橫：戰後臺灣省營公路客運之變遷》。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吳政憲

2018 《帝國之弦：日治時期臺日海底電纜之研究（1895-1945）》。新北：稻鄉出版社。

2018 《檜林、溫泉、鐵線橋：近代八仙山林場的成立與旅行書寫（1910-1930）》。新北：稻鄉出版社。

李　理

2019 〈1950 年「台日贸易协议」的签订及影响〉，《台湾研究》（北京）156: 85-94。

李力庸

2017 〈深耕臺灣：2013-2015 年農業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漢學研究通訊》（臺北）36(4): 1-13。

2019 〈戰後桃園地區稻米的生產與流通〉，收於李力庸主編，《經緯桃園：2018 桃園學》，頁 217-251。桃園：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李文良

2019 〈積泥成埔：清代臺江內海「港口濕地」的築堣與認墾〉，《臺灣史研究》（臺北）26(3): 1-37。

李佩蓁

2013 〈依附抑合作？清末臺灣南部口岸買辦商人的雙重角色〉，《臺灣史研究》（臺北）20(2): 31-76。

2018 〈商民樂從？：臺灣釐金制度與官商利益結構（1857-1886）〉，《臺灣史研究》（臺北）25(2): 61-95。

2019 〈制度變遷與商業利益：以中英商人在臺灣樟腦貿易的行動為中心（1850-1868）〉，《新史學》（臺北）30(1): 1-53。

李宗信、顧雅文

2014 〈近二十年來應用歷史地理資訊系統的回顧與展望：以臺灣區域史研究為例〉，《臺灣史研究》（臺北）21(2): 167-196。

李博强

2019 〈管理、法规与资本体系的重构：甲午战后日本对台湾盐政的殖民化改造〉，收於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編，《近代台湾史研究的新进展：纪念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 7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頁 672-69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進億

2019 〈八七水災與農地重劃：以災區農地重劃為中心的考察〉，《臺灣史學雜誌》（臺北）26: 39-64。

李瑞宗

2018 《大甲溪：水電俱樂部》。臺北：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後山電火：東部水力發電》。臺北：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李維修

2018 〈消逝的逆旅：竹陽軒與塚迺酒家〉，收於韋煙灶主編，《從清代到當代：新竹 300 年文獻特輯》，頁 207-227。新竹：新竹市文化局。

汪小平

2019 〈台湾经济政策改革缘起探讨（1950-1960）〉，收於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編，《近代台湾史研究的新进展：纪念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 7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頁 747-76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松浦章（著）、年旭（譯）

2018 《茶葉・香蕉・鰹節：日治時期臺灣農水產品的海外輸出》。新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林丁國

2019 〈內海忠司與高雄港擴建：以遷移海軍航空隊基地和建設工業地帶為中心（1935-1939）〉，《高雄文獻》（高雄）9(1): 7-29。

林文凱

2014 〈晚清臺灣開山撫番事業新探：兼論十九世紀臺灣史的延續與轉型〉，《漢學研究》（臺北）32(2): 139-174。

2017 〈臺灣近代統治理性的形構：晚清劉銘傳與日治初期後藤新平土地改革的比較〉，《臺灣史研究》（臺北）24(4): 35-76。

2018 〈貌合神離之兩岸關係：戰爭前夕福建與臺灣的經建與農業調查之交流（1934-1937）〉，《臺灣史研究》（臺北）25(4): 119-162。

2018 〈日本治臺經驗取鑑：戰前福建官方的臺灣調查與考察活動之分析（1911-193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臺北）101: 117-155。

2018 〈晚清臺灣的財政：劉銘傳財政改革的歷史制度分析〉，《臺大歷史學報》（臺北）61: 341-392。

林玉茹

2009 〈2007 年臺灣經濟史的回顧與展望〉，《漢學研究通訊》（臺北）28(4): 17-31。

2010 〈從屬與分立：十九世紀中葉臺灣港口城市的雙重貿易機制〉，《臺灣史研究》（臺北）17(2): 1-37。

2018 〈進口導向：十九世紀臺灣海產的生產與消費〉，《臺灣史研究》（臺北）25(1): 39-100。

2019 〈政治、族群與貿易：十八世紀海商團體郊在臺灣的出現〉，《國史館館刊》（臺北）62: 1-51。

林欣誼、陳歆怡

2018 《古道電塔紀行：舊東西輸電線世紀回眸》。臺北：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林蘭芳

2013 〈戰後初期資源委員會對臺電之接收（1945-1952）：以技術與人才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臺北）79: 87-135。

洪紹洋

2010 〈戰後臺灣機械公司的接收與早期發展（1945-1953）〉，《臺灣史研究》（臺北）17(3): 151-182。

2012 〈2011 年臺灣史研究回顧與展望：經濟史〉，發表於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2011 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頁 1-1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行政大樓 7 樓第一會議室，12 月 7 日。

2018 〈軍需與民需的生產轉換：終戰前後臺灣兩次硫酸錏工廠的創辦〉，《臺灣史研究》（臺北）25(3)：141-178。

2019 〈臺灣麻紡織事業的興起與限制（1895-1936）〉，《國史館館刊》（臺北）60: 43-87。

2019 〈外資、商業網絡與產業成長：論出口擴張期臺灣的日資動向〉，《臺灣史研究》（臺北）26(4): 97-141。

2019 〈2016-2017 年臺灣經濟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臺北）26(2): 151-180。

洪廣冀

2018 〈從「臺灣之恥」到「發展最速的產業」：再思日治時期臺灣的科學林業與工業化〉，《臺灣史研究》（臺北）25(3): 83-140。

赵从胜

2019 〈近代殖民主义下台湾与海南农业关系研究〉，《台湾研究集刊》（厦門）163: 73-81。

涂懿文

2018 〈從歷史與空間觀點看高雄旗津當代的發展與變遷〉，《高雄文獻》（高雄）8(1): 89-128。

張心穎

2018 〈基隆港區域發展與市街地景變遷〉。花蓮：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碩士論文。

張怡敏

2019 〈新高銀行與北臺灣茶業的資金流動：兼論桃園地區三支店的經營〉，收於李力庸主編，《經緯桃園：2018 桃園學》，頁 181-215。桃園：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張維安、張志宇

2019 〈土地、族群與經濟活動：中港溪與後龍溪流域的客家經濟特色〉，收於俞龍通主編，《客家文化產業生成與發展》，頁 27-55。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

張瀚壁、黃玫瑄

2018 〈客家移民、文化與經濟生活：以池上地區為例〉，《臺灣風物》（臺北）68(4): 137-165。

莊天賜

2019 〈日治初期臺南地區製糖業之變遷（1895-1911）〉，《臺陽文史研究》（臺南）4: 43-72。

莊建華、余姿慧、曾子容

2019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稛源商店六龜支店暨洪家家族文書史料介紹〉，《高雄文獻》（高雄）9(2): 138-158。

莊濠賓

2018 〈世變下臺灣地主層的沒落：以四大公司民營化為例（1949-1957）〉。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2019 〈戰後的土地改革在桃園：以地主為中心的視角研究（民國 38-44 年）〉，收於李力庸主編，《經緯桃園：2018 桃園學》，頁 135-177。桃園：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許淑娟

2019 〈日治初期高雄平原區低丘的林野開發〉，《高雄文獻》（高雄）9(2): 33-71。

陳正哲

2004 〈植民地都市景観の形成と日本生活文化の定着：日本植民地時代の台湾土地建物株式会社の住宅生産と都市経営〉。東京：日本東京大学大学院工学系研究科博士論文。

陳玉箴

2018 〈環境、軍需、移動人口：澎湖餐飲業歷史變遷與「島嶼型食生活」研究〉，《臺灣史研究》（臺北）25(3): 1-42。

陳志豪

2019 《清代北臺灣的移墾與「邊區」社會（1790-1895）》。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陳佳德、傅希堯

2018 《傳說：竹門秘境 微光往事》。臺北：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陳計堯

2019 〈人流、物流、金流：條約港體制下南臺灣與日本的經貿關係（1865-1895）〉，《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臺南）18: 7-67。

陳家豪

2011 〈建構中的「桃園學」研究〉，《臺灣學通訊》（新北）58: 15。

2018 《近代臺灣人資本與企業經營：以交通業為探討中心（1895-1954）》。臺北：政大出版社。

2018 〈桃園前瞻軌道計畫的前奏曲：1910 年代桃園——大溪的電車計畫〉，《桃園文獻》（桃園）5: 41-62。

陳凱雯

2018 《日治時期基隆築港之政策、推行與開展（1895-1945）》。臺北：國史館。

陳慈玉

2009 〈斷裂與連續：戰時到戰後初期臺灣重要軍需工業的變遷〉，《兩岸發展史研究》（桃園）7: 145-189。

2009 〈連續與斷裂：二十世紀的臺灣煤礦業〉，《新亞學報》（香港）27: 53-101。

陳鴻明

2019 〈政治劇變與企業因應：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遷臺與復業的曲折發展（1950-1965）〉，《國史館館刊》（臺北）60: 89-138。

陳鴻圖

2019 《人物、人群與近代臺灣水利》。新北：稻鄉出版社。

陳鸞鳳

2018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的發展〉，收於韋煙灶主編，《從清代到當代：新竹 300 年文獻特輯》，頁 391-407。新竹：新竹市文化局。

曾令毅

2018 〈近代臺灣航空與軍需產業的發展及技術轉型（1920s-1960s）〉。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曾立維

2018 〈近代通訊與殖民地臺灣：以電報、電話為中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曾品滄

2019 〈美國的滋味：冷戰前期臺灣的可口可樂禁令與消費（1950-1967）〉，《臺灣史研究》（臺北）26(2): 113-150。

程朝云

2019 〈土地政策与农业现代化：战后台湾「第二次土地改革」之争〉，收於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編，《近代台湾史研究的新进展：纪念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 7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頁 763-77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黃俊凌

2019 〈光复初期台湾善后救济分署平售救济面粉之探析：与苏瑶崇先生商榷〉，收於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編，《近代台湾史研究的新进展：纪念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 7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頁 704-7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黃仁姿、薛化元

2019 〈戰時與戰後初期臺灣農業組織的調整與變革（1941-1948）〉，《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臺北）51: 121-172。

黃正宗

2019 〈戰後臺灣戰爭保險金求償問題研究（1945-1957）〉，《臺灣文獻》（南投）70(2): 33-83。

黃梧桐（主編）

2019 《臺灣合成樹脂產業發展史》。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化工史料館；高雄：長興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紹恆

2019 《砂糖之島：日治初期的臺灣糖業史 1895-1911》。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

黃富三

1982 〈清代臺灣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上）〉，《臺灣風物》（臺北）32(4): 104-136。

1983 〈清代臺灣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下）〉，《臺灣風物》（臺北）33(1): 92-126。

1984 〈清代臺灣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續補）〉，《臺灣風物》（臺北）34(1): 140-123。

1999 〈臺灣開港前後怡和洋行對臺貿易體制的演變〉，收於黃富三、翁佳音主編，《臺灣商業傳統論文集》，頁 81-106。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黃頌文

2010 〈清季臺灣貿易與寶順洋行的崛起（1867-1870）〉，《臺灣文獻》（南投）61(3): 107-149。

黃儒柏

2018 〈濁水溪下游糖業鐵路與地方經濟之發展（1907-1939）〉，《臺灣文獻》（南投）69(1): 123-172。

2019 〈戰後濁水溪下游糖業鐵道的重構、盤整與衰微（1945-1990）〉，《臺灣風物》（臺北）69(3): 125-174。

葉振輝

1987 〈天利行史事考〉，《臺灣文獻》（南投）38(3): 41-45。

1994 〈一八五〇年代怡和檔臺灣史料輯要〉，《高市文獻》（高雄）6(3): 1-15。

1994 〈一八六〇年代怡和檔臺灣史料輯要〉，《高市文獻》（高雄）6(4): 1-16。

1994 〈一八六〇年代怡和檔臺灣史料輯要（續）〉，《高市文獻》（高雄）7(1): 1-24。

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8 《濁水溪：引水成電 川流不息》。臺北：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劉芷瑋

2018 《交通、人流、物流：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對於水里地區的影響（1919-1945）》。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歐素瑛

2018 〈臺灣省議會對糧荒問題之調劑（1946-1951）〉，《臺灣學研究》（新北）22: 35-76。

鄧宏旭

2018 〈日治時期臺灣都市不動產業之形成與影響：以基隆、臺北、高雄為例（1895-1936）〉。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2019 〈前進「南下第一站」：民國 80 年代桃園地區的住宅市場〉，收於李力庸主編，《經緯桃園：2018 桃園學》，頁 253-296。桃園：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鄭維中

2018 〈烏魚、土魠、虱目魚：多元脈絡下荷治至清領初期臺灣三種特色海產的確立〉，《臺灣史研究》（臺北）25(2): 1-60。

賴玉玲

2019 〈客家族群的遷徙與經濟發展：以新竹關西與高雄美濃地區為例〉，收於俞龍通主編，《客家文化產業生成與發展》，頁 57-105。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

謝國興

2013 〈戰後初期臺灣中小企業的殖民地傳承〉，收於謝國興主編，《邊區歷史與主體性形塑：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頁 45-85。臺北：中央研究院。

鍾淑敏

2018 〈英商三美路商會（Samuel Samuel & Co., Ltd.）與日治前期臺灣的產業發展〉，《臺灣史研究》（臺北）25(2): 97-143。

韓正誼

2019 〈南投地區輕便鐵道之發展與地方產業（1903-1936）〉。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韓尚儒

2018 〈竹東發展與林業變遷（1940-1989）〉。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瞿宛文

2007 〈戰後臺灣經濟成長原因之回顧：論殖民統治之影響與其他〉，《臺灣社會研究季刊》（臺北）65: 1-33。

2010 〈臺灣戰後工業化是殖民時期的延續嗎？兼論戰後第一代企業家的起源〉，《臺灣史研究》（臺北）17(2): 39-84。

羅時承

2019 〈阿里山森林鐵路的身分價值變遷：從殖民產業到國家級重要文化景觀〉。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碩士論文。

鐘大益

2018 〈戰後社頭織襪產業發展之研究（1945-2005）〉。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Vol. 29, No. 1, pp. 209-247, March 2022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aiwan)

Retrospect of Economic History Research in Taiwan (2018-2019)

Hao-bin Jhuang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on economic history of Taiwan between 2018 and 2019. It begins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history research by summar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sub-topics of the field from 2008 to 2017, followed by a general review of research on economic history of Taiwan between 2018 and 2019, and finally the author's views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field.

Studies conducted between 2018 and 2019 are divided into several sections, with the aim of discussing and summarizing the overall trend of the field. Titles of these sections are: (1) "State, Economic Policy, and Fiscal System," with subcategories of "Qing Dynasty and Japanese Colonial Rule" and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and the Contemporary Era"; (2) "Regional History," in which North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Taiwan were discussed respectively; (3) "Industrial History," dealing with agriculture, industry, commerce, forestry, electricity, and communications; (4) "Diet, Consumption, and Recreation"; and (5) "Environmental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s." With easy access to research materials on regional history and local industrial history, a lot of scholars have been concentrating on these topics. On the other hand, topics such as diet, recreation, and environment history have drawn increasing attention nowadays. There is also a trend of combining economic history studies with social and culture history studies. Moreover, traditional research topics have been gradually transformed or revised due to the emergence of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As the Taiwan government promotes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ulture and history will become a trend. In addition, thanks to local governments' ongoing promotion of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projects or local studies, as well as several public sectors' efforts in making rare historical materials accessible to the public, local economic history studies will continue to grow in the coming years.

In summary, although the overall research trend still contains worrisome elements mentioned in previous review articles, research on economic history of Taiwan is expected to move in a positive direction because of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methodology and emergence of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Keywords: Economic History of Taiwan, Regional History, Industrial History, Local Studies, Economic Policy